

国家政治经济公务人员重要读物

银弹攻势

——日本以“金钱政治”手腕
操纵美国的经济贸易政策

[美] 帕特·乔特 著
林晨辉 等译



中国经济出版社

国家政治经济公务人员重要读物

银 弹 攻 势

——日本以“金钱政治”手腕操纵
美国的经济贸易政策

[美] 帕特·乔特 著

林晨辉 等 译

孔凡军 赵 燕 校

中 国 经 济 出 版 社

(京) 新登字079号

内容提要

这是一本在美国发行之之前就引起了巨大反响、在中国也必将会引人注目的政治经济书籍,1990年10月出版于美国。全书通过“日本在美国的影响”、“日本在美国的院外活动”、“日本在美国的政治战”和“日本在美国的宣传战”四大部分向读者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日本用重金雇佣美国人充当走廓客(即在美国国会走廊里活动的说客),他们的影响力渗透到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角落,把美国引向崩溃!”本书以大量实例揭露了美国前总统和政府高级官员的不光彩行径。书后还附有代表外国利益的前联邦政府官员名单和在美国注册的日本代理人名单。

读者对象为政府官员、外交人员、经济管理部门和企业领导干部、大专院校师生,特别值得外交、经贸、计划、宣传、新闻、监察、纪检、司法、国家安全等系统的广大干部一读。

责任编辑:栾建民

封面设计:王 滨

版式设计:刘 青

责任印制:张江虹

银 弹 攻 势

【美】帕特·乔特 著

林晨辉 等 译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3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广内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0.125 印张 249 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5001—13000

ISBN 7-5017-1241-7/F·800

定价:4.50元

译者序

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国际关系更加错综复杂的年代。国际关系中的朋友与敌人在概念上将变得越来越难以辨别、越来越难于确定，在经济和贸易问题上许多国家将互为对手。可以预见，各国都将不得不重新对他们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概念进行定义，以适应变迁中的现实。

此刻，读一读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帕特·乔特的这本最新力作，或许对于把握正在到来的复杂年代能提供有益的指南。帕特·乔特从国际经济竞争和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全面分析了日本是如何成功地运用“金钱政治”的手段增强它对美国在经济竞争中的战略优势，为日本在美国的经济利益服务，从而揭示了美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所存在的巨大漏洞及其令人触目惊心的严重后果。其中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我国是一个实行开放政策的发展中大国，正越来越深地介入于国际经济生活，今天我们在国内和国外两条战线、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上都正面临着日益增强的巨大的国际竞争的压力。借鉴美国的教训，我们必须很好地研究我国国内市场的国际竞争问题，一方面制订正确的贸易政策，以做到既坚持对外开放又保护国家工业的发展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强国家安全工作，有效地反对和防止外来利益集团的政治渗透和经济渗透，确保我国经济及贸易政策的制订符合国家利益的要求，巩固国家的政治安全 and 经济安全。

本书的原名是《有影响的代理人——日本在美国的院外活动集团是如何操纵美国的政治经济体系的》，1990年10月出版，它具有广泛的参考价值。上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到关心国家利益的普通公民都能从中得到启发。外交、经贸、计划、宣传、新闻、监察、纪检、司法以及国家安全等战线的同志，尤其应该读一读这本书。

帕特·乔特（Pat Choate）是当今华盛顿商界和政界圈内最知名的人物之一，是一位专门研究竞争力、管理和公共政策问题的美国政治经济学家。除了本书之外，他的著作还有：《崩溃中的美国》（有关美国基础结构的衰败问题）、《重建美国经济、保持世界第一》（分析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存在的基本问题），以及最近的《高度扭曲的社会》（引起了国际上对美国经济国际竞争力衰退的关注）。

全书的翻译工作有下列同志参加：

林晨辉译前言、导言、第一章、结束语，与蒋志刚、孟永红合译第四、五章，与赵忠云、鲍风合译第六章和第十章。

陈豫贤译第二、三章，魏勤和贺剑敏译第七、八章，刘学新译第九章，王敏正和黎新译第十一、十二章。

全书由林晨辉统稿，由孔凡军、赵燕担任译校。

林晨辉

1991年4月10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

前 言

日本如同美国的第三个政党，在全美持续展开“竞选”运动。每年，它向华盛顿数以百计的政治说客、超一流律师、前政府高级官员、公共关系专家、政治顾问甚至前总统支付至少1亿美元的佣金，还要另外花上8亿美元来通过全国性的地方政治网络左右美国的公共舆论。

比起美国的政党或任何国内产业部门、工会组织或其它特殊利益集团，日本在美国开展的政治运动，资金更充足、影响更广泛、行动更有效。日本的这种政治活动服务于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左右华盛顿那些对日本公司或日本经济的利益有直接影响的政治决策。这些决策的不同，意味着每天数亿美元或累计数十亿美元的损益。

日本通过抢在美国企业前头掌握美国政府有关决策的情报，操纵在华盛顿有着良好关系网的内线人物及说客网络，组织基层的政治网络，左右传播媒介所覆盖的经济问题的范围，动员在美国思想库及大学里工作的有影响的知识界人士制造舆论，日本能够把在美国用金钱买来的政治影响力作为其公司和国家战略的关键因素来加以运用。

这种政治运动，日本在美国已经搞了20多年了。取得的政治胜利，包括了消费类电子产品、超级计算机、机床、轴承、光纤、人造卫星、大米、生物技术、航空运输、电信、半导体器件以及法律、金融服务和其它数十种产品或产业部门。现在，无论多么有竞争力，在美国没有一个行业是安全的。

和在商业上一样，日本的国家战略在政治上遵循着一个简单而可以预测的模式：在防止外来渗透保护住自己的国内市场的同时，尽可能占领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基本政治差别，是日本国家战略得以成功的主要条件。

这些政治差别的例子有：

日本不会容忍它的高层政府官员充当其它国家的高级说客，而美国却能容忍。

日本不会允许其政治人物或政党接受来自任何外国人、外国公司或受外国人操纵控制的组织的捐赠，而美国却允许。

日本不会许可外国利益集团在它的人民中间展开深入基层的政治运动，而美国却许可。

日本不会依靠外国的金钱来研究确定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长期角色，而美国却这样。

日本不会允许其它国家操纵其小学、中学和大学教材的编写，而美国却允许。

总之，美国容许外国干预其国内事务，但日本不容许。这一基本的政治差别是日本的贸易谈判代表和日本的公司之所以成功而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和美国的公司之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这反映了数以百计的构成美国统治阶级一个重要部分的美国人所作出的个人和职业的决策。

从历史的角度透视这种事情。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凡尔赛和约谈判中扮演关键角色之后，1919年从英国财政部辞职时，他面临一个如何谋生的问题。他以前在政府工作时每年工资是1200镑，凯恩斯在他的一生中从不嫌挣钱多，自然也就希望能多挣些。他被聘为两个著名斯堪地纳维亚实业家控制的英国北方商业银行董事长，一星期只要工作一天，他一年即可收入2000镑。但他感到他不能接受。“我觉得他们需要我，”他在给他父亲的信中写道，“因为他们认为我在财政部和外交部方面能为他们所

用；然而事实上，我根本不会去替外国人来对付我们自己的政府部门的。”在今日的华盛顿，诸如此类的政治道德准则似乎不复存在了。

本书描述的公共道德的沉沦，是美国的一大弱点。这并不是由于日本人或任何其它外国利益集团邪恶行径导致的结果。美国的外国竞争者只是通过美国人来利用美国的法律空子和现成的服务，最大限度地增强他们在美国的经济和政治优势。所以，任何对外国在美国内部事务上的不适当影响的愤慨，应针对那些曾经支持不断削弱美国国家公务活动价值的人。而这些公务活动一直指导着我们的公共生活。

很自然，许多充当外国利益集团代理人的人——特别是那些曾在美国政府服务过的人，反对对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及其给美国带来的后果的任何调查。许多外国公司和政府也反对这种调查。

他们的批评通常采取三种形式。第一，他们声称调查美国政治和经济体系中的外国影响是“麦卡锡主义”的回潮。但是，这个问题不是爱国主义或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这关系到系统的、看得见的和致命的政治腐败，而所有这些又都是完全合法而受到普遍容忍的，至少在华盛顿是如此。

第二，他们的批评称对日本在美的政治活动、院外游说活动和宣传活动的分析是“对日本的攻击”或是“种族主义”。当然了，某些美国人是种族主义者，某些对日本的攻击也时有发生。但是，有关种族主义和“对日本的攻击”的绝大多数指责，只不过是用来迷惑美国人的注意力和自信心的一种诡计。

这里之所以列举日本的政治攻势，主要是因为日本人在美国有最无孔不入、最复杂和最成功的政治——经济机器。其它国家正在模仿它在美国建立相类似的政治渗透网。所以在这里审视一下日本的政治活动，可以为判断更广泛范围内的变化趋势提供方便

的指南。

最后，某些人对于调查外国人的游说、政治和宣传活动的抗议，是基于“日本及其它外国利益集团只不过是按美国规则行事”的理由的。他们的观点认为，既然这种规则允许华盛顿的局内人下最大的赌注去获取影响力，那么也应当允许外国人同样去这么做。我的观点是这种“规则”本身对美国的利益是有害的，因而需要根本的改革。

应给予外国利益集团在华盛顿充分表演的机会。总之，对于他们来说政治原因与国内利益集团的原因同等重要有时甚至还更重要。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样的表演的性质和形式。

我在结束语那一章里对于这种“规则”的任何改革提出了建议，这些建议同样适用于国内和外国利益集团。美国政治原则受到国内利益集团的腐蚀，其破坏性并不比外国利益集团小，也不应是人们所期望的。

现在真正的问题是，无论日本还是其它外国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和经济体系的操纵，都已达到了威胁我们国家的主权和未来命运的程度，我们对此应采取什么行动？

导 论

Alfalfa俱乐部是华盛顿最排外、最鲜为人知的组织之一。它命名古怪，是美国最有权势的男人们的组织。它唯一的使命，是每年在华盛顿的一家饭店组织一次俱乐部成员的聚会同时举办一次便于交流政治笑话的晚餐会。

1989年聚会，是俱乐部的第76届年会。到会的客人中，有乔治·布什总统、丹·奎尔副总统、最高法院所有男性大法官、布什内阁全体成员、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国会领导层成员、工商界巨头、前联邦政府的高级官员以及华盛顿地区的大批政治掮客。

参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本特森参议员，是俱乐部1989年度主席。他的开幕词引发了那天晚上最强烈的笑声。本特森参议员说：“当我告诉妻子，准备去参加和掌握着美国未来命运的政界和工商界巨头们聚会时，她问道：‘噢，你要去东京？’”。

其实，本特森并非玩笑。

美国正在把整个经济卖给日本。同时，也正在放弃与所有权相关联的政治和经济控制权。在80年代，从1980年至1988年，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增长了10倍以上。现在，日本人——

- 拥有2850亿美元的美国直接资产和证券资产；
- 控制了超过3290亿美元的美国银行业资产（占美国银行业资产的14%）；

- 控制了加利福尼亚州银行业资产的25%以上以及其未清偿贷款的30%；
- 在美国拥有的不动产超过欧洲共同体的总和；
- 购买了30%~40%美国财政部债券；
- 占有了纽约股票交易所日交易量的25%；
- 美国市场上20%的半导体器件、30%以上的汽车、50%的机床以及绝大部分消费类电子产品和其它数十种商品和服务是日本提供的。

外国人在美国投资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在19世纪，英国的资本曾经帮助了美国的发展。英国、荷兰和加拿大的投资者至今仍然掌握着数量可观的美国股份。但是在80年代，日本资本在美国的扩张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国家。预计到1995年，日本将成为美国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到1999年日本投资者所拥有的美国资产将超过英国、荷兰和加拿大的总和。

为保护和促进他们的投资，日本的财产所有者们正在建立一个遍及全美国的复杂的政治影响网络。这一网络正被用来收买政客、左右公共舆论、资助政治竞选、阻止或孤立那些针对日本的批评以及在美国联邦政府安插高级官员。至此，日本对美国内部事务的广泛介入已经使得美国的贸易政策经常是根据日本的利益而不是根据美国的利益来制订的。

早自1793年起，外国利益集团就一直经常试图影响美国的政治生活和公众舆论。希腊说客曾成功地动摇了美国与希腊的敌对邻国土耳其的关系。多少年来，蒋介石的说客支配着美国对中国问题的观点。以色列说客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制订过程的影响是强有力的。爱尔兰说客长期以来支配着美国对北爱尔兰政策的形成。

在所有国家中，只有日本最深刻地理解到在美国政治权力是一种出最高价钱即可买到的商品。在所有国家中，只有日本一直

以最大的努力左右美国的态度和行动。在所有国家中，只有日本对美国的经济和贸易政策施加了最为引人注目的影响。在所有国家中，也只有日本在美国最成功地运用其政治影响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

日本在美国之所以有这样强有力的政治存在，是因为日本重金雇佣了众多的说客、政治顾问和公共关系代表。依顺序排列，英国、日本、荷兰和加拿大是美国四个最大的外国投资者；1990年，这些国家在华盛顿雇佣院外游说活动、公共关系和法律服务机构的数量分别是：日本92家、加拿大55家、英国42家、荷兰7家，显然日本在这方面是加拿大的1.5倍、英国的2倍、荷兰的13倍。

与其它国家相比，日本在美国展开的政治攻势，手法有相当明显的不同。在美国的日本政治机器，日夜运转并横跨东西海岸。这部政治机器的基础是外交、游说、政治活动和宣传攻势，其中的每一个方面都经精心策划而且相互之间配合良好。相比之下，加拿大和其它西欧国家仍然主要是依靠传统的外交途径来影响美国的经济和贸易政策。和它们的美国同行一样，大多数加拿大及西欧的企业只是在进行诸如反对美国的某种关税而需要帮助时才在华盛顿派驻代表。

日本人几乎是畅通无阻地进入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而他们自己的政治经济体系对于美国来说则基本上是封闭的。例如，美国的前任贸易官员可以为几乎是任何人游说，但绝大多数的前任日本政府官员是不愿为美国公司工作的。

具有相同政治重要性的是，日本人不愿意在外国人面前批评他们自己的政府。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国际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指出，尽管每个人都知道日本在大米方面的保护主义政策对于日本消费者来说代价高昂。但“即便是在非正式谈话中，来自私营部门的经济学家也拒绝承认大米政策是代价高昂的，当迫不

得以时，他们就解释说，他们觉得当外国人的面批评自己的政府是不适宜的”。

尽管日本人宣称他们的市场是开放的，但外国人在那里的销售量却相对少得多。日本制成品进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只是美国的一半，不及德国和其它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1/8。尽管日本人还宣称。它的经济门户对外来投资是开放的，但实际上外国投资者却面临无边的隐蔽的障碍。在日本，每年只有不到30家公司出售给外国投资者，这些公司中大多数规模很小，无足轻重或陷入严重的困境之中。尽管美国经济的规模是日本的两倍，但美国在日本直接投资的总额不到170亿美元，大约是日本在美国直接投资的1/5。

总之，日本的工商企业可以方便地在美国进行投资和销售活动，而美国的企业却发现在日本进行投资和销售活动有多难。日本公司可以随心所欲地参与美国的政治生活，而美国公司却不可在日本做同样的事情。日本可以雇佣美国人来公开批评美国政府的政策，而日本人却不会为了外国人而批评日本政府的政策，即便是在私下场合也不愿意。这样的结果是，日本对美国公司不仅具有战略性的经济优势而且具有战略性的政治优势。

日本在美国的政治机器的使命就是维持这些优势，具体的目标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 一、保持美国市场对日本出口的开放；
- 二、为日本更多地购买美国关键性资产扫清道路；
- 三、防止日本不良的贸易行为被发现或受批评；
- 四、化解日本的美国竞争对手的政治反击；
- 五、支配美国对日本以及对日本有重要经济利益的欧洲其它国家的贸易政策；
- 六、朝着使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无力对付日本贸易政策的方向推动日美经济一体化。

在日本获得成功之后，南朝鲜、台湾地区以及好几个欧洲国家现在都正在美国建造他们各自的政治机器。他们的目标是：增进他们在美国的利益并对付日本在美国政府中日益增长的影响。

尽管日本在美国的政治机器是由东京来驱使和操纵的，但是这部政治机器基本上是由美国人构成的。其费用每年超过4亿美元，大体上相当于1988年美国众参两院国会选举花销的总和。其中，至少有1亿美元的日本金钱流入华盛顿的说客、超一流律师和政治顾问的腰包；另外3亿美元则用来拓展美国的州和地方一级的亲日本的政治网络。

这些金钱资助了种种经过精心设计的、目的在于左右美国人民的态度和他们政府的行动的活动。例如，为左右美国未来领导人的思维，日本的许多机构出资资助出版发行那些用来教育美国学生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有关日本问题的教材。这种教材除了日本的宣传之外没有别的东西。

最近，日本买下了5所美国高等学府：科罗拉多的雷杰斯学院和罗勒托高等学院、俄勒冈州的瓦纳太平洋学院、塞勒姆学院和东京国际大学。而且，日本最近还在华盛顿郊区建造第六所大学。在今后的10至20年里，这些大学的日本毕业生将会逐渐接管日本目前所忙于获取的美国资产。

为左右美国公众关于对日政策的辩论，日本人正资助越来越多的从事政策研究的学者和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和学者是美国政府中那些带来自己的思想和政策主张的民选和任命官员的来源。虽然这些学者的诚实性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数量可观的日本金钱经常使某些有关美国的政策选择问题的一系列特定观点有着显著的放大效应。到目前为止，日本差不多资助了所有的由美国大学和思想库承担的美日关系问题研究项目。同时，日本还对那些对日本的贸易政策主张进行批评的人和批评本身的专业立场展开全面的攻击。

为影响美国各贸易协会的政策主张，日本公司已加入了几十个这类组织，而且现在在为这些组织确定政策和院外游说活动的日程表。此外，日本人还经常有亲日主张的前台组织，通过由美国分销商、供应商、承包商以及他们的地方伙伴组成的巨大网络来控制这些影子政治联盟的运转。日本人公开要求那些要进入日本市场的美国公司表明能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或在其它场合中支持日本的主张。

为左右美国国家一级的政治生活，日本人正开立一张永久性工资表，向美国各政党领导人和许多为总统、国会议员、州长和市长工作的高级政治顾问们支付薪金。现在日本的许多大公司正在加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资助者的行列，商业利益驱使日本商界为国会议员竞选候选人捐赠大笔政治行动委员会（PAC）赠款。日本各公司还经常向他们的美国雇员灌输如何参加政治选举，同时还鼓励他们为日本的利益进行国会的院外活动。

为影响美国州和地方的决策，日本已建立起一个深入基层的政治网络。这个政治网络包括了数十个日本商会、五个美国州长与日本工商界领导人的地区性协会。此外，日本还战略性地在美国设立了16个咨询与贸易办事机构。在日本政府的力导下，日本各公司正向地方市政以及社会福利项目捐赠数以亿美元计的赠款，以此通过选民和地方支持者来对美国国会施加影响。

为左右美国总统的经济贸易政策选择，日本经常以停止为美国联邦政府巨大的赤字提供资金相威胁。1989年这一经济讹诈是如此明显，从而使布什总统公开提醒美国人不要过分抱怨日本人在美国的投资和贸易行为，否则日本人将会限制新的资金的提供。

为支配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日本建立了一支由数百名说客组成的队伍。这些人中，有许多以前是联邦政府的官员，正如目前在任的许多政府官员曾经是日本的说客。日本每年在华盛顿的政

治努力中所花费的金钱，超过美国商会、美国全国制造业者协会、工商业圆桌会议、经济发展委员会和美国商业会议等5家华盛顿最有影响的工商组织每年费用总和。

日本对美国政治体系的介入，现在已经到了威胁美国政治的可靠性的地步。在他们自己国内，日本人称这种金钱政治为“结构性的腐败”。这里的意思是在决策中渗入了分量可观的日本主张，使得决策的最终结果结构性地偏向于日本的利益和日本的偏好。

日本人现在能有效地动员足够的美国政治权力，挫败他们所不欢迎的任何美国立法。他们对于任何一项不利于日本的美国法律或政策置之不理。他们能够在政治上有效地打击他们所反对的美国企业、工会或任何其它利益集团的组合。

今天日本人支配着决定关税税率、联邦政府对诸如半导体器件和高清晰度电视（HDTV）等关键技术的支持等每件事情的美国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的确，在那些将决定哪些美国产业部门继续生存下去而哪些部门将走向死亡、哪些地区将兴盛或衰落、哪些职业将存在而哪些将消失的政策设计上，日本人发挥了支配性的影响。

虽然没有人对于是否应允许日本和其它外国利益集团在华盛顿活动提出疑问，但是人们应该就其活动的形式和性质提出以下问题：

那些熟知华盛顿的经济和贸易战略机密的美国前高级官员是否应被允许为日本和其它外国经济对手从事游说活动？

日本和其它外国企业是否可以操纵政治行动委员会和参与资助（哪怕是间接资助）美国的选举活动？

是否应当允许日本在美国进行秘密宣传活动？

美国国会对于日本公司的政治压力是否已变得过于敏感？

日本对那些为美国政治候选人、当选官员和政策制订者出主意的美国思想库和学者提供的支持具有什么样的渗透性？

日本的投资、院外活动、政治渗透和宣传攻势是否危及美国的国家主权？

对于这些问题，无论答案是什么，本书的中心论点是：对于美国国内政治权力向外国转移负有最终责任的是美国人民自己，而不是日本人或其它任何国家。

如果政府前任高级官员的行为准则允许对美国利益有害的“旋转门”腐败行为的存在，那么美国人民有责任改变这些准则，而不是留待从中渔利的外国利益集团。

如果外国利益集团的金钱攻势过于隐蔽，那么爱追根刨底的美国新闻媒介、富有调查能力的美国政府和富有警惕性的美国社会公众有责任使之在公众视野中曝光。

如果国家在美国小学、中学的世界历史、地理、经济和语言教育方面投资太少，那么错误的键不在于日本人用那些为自己利益服务的宣传来填补这些真空而在于我们允许他们这样做。

如果是巨额的联邦预算赤字正迫使美国过量地借债和出售生产性资产，那么应负起预算改革责任的是美国的立法者、工商业界和纳税人而不是外国债权人和投资者。

如果美国工商界和政府之间的相互隔离导致了外国经济竞争对手可以利用的政治真空，那么在相互间建立起更密切、更合作的关系的责任就落在美国公司和美国政府官员的身上而不是外国政府和它们的公司身上。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是一本关于日本或任何其它外国利益问题的书。它只论及美国国家治理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外国利益集团被允许通过政治操纵来确保它们在美国政治生活和政策制订过程中的巨大影响力。

纠正这一问题的责任完全只能由我们自己来承担。毕竟，美国及其政府是属于我们的。

回顾迪佩·斯诺特关于如何理解水门事件的忠告：“请追随